

7.3.7
16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eter Gourevitch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

[美]彼得·古勒维奇 著/袁明旭 朱天飏 译

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

[美]彼得·古勒维奇 著/袁明旭、朱天飏 译

Politics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Peter Gourevitch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olity Press授权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中文版。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 (美)古勒维奇 (Gourevitch, P.)
著; 袁明旭、朱天飏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比较政治经济系列)

书名原文: Politics in Hard Times

ISBN 978-7-80720-790-0

I. 艰… II. ①古…②袁… III. 经济危机—对比研究—世界 IV. F1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4119号

书 名: 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著 者: [美]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译 者: 袁明旭 朱天飏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顾学云
装帧设计: SDDoffice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20-790-0
定 价: 3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国际编委会

Ha-Joon Chang(剑桥大学经济学院)

Peter Evan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Peter Gourevitc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Stephan Haggar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Peter Hall(哈佛大学政府系)

David C. Kang(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

Peter Katzenstein(康乃尔大学政府系)

Michael Man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Atul Kohli(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Margaret Lev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Mathews(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

Joel Migdal(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Gregory Noble(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Ove Pedersen(哥本哈根商学院商业与政治国际中心)

Adam Przeworski(纽约大学政治学系)

Herman M. Schwartz(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

Linda Weiss(悉尼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Meredith Jung-En Woo(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Zys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

英文版前言

七年的丰年，七年的荒年——这是《圣经故事》中对经济周期概念的表述。虽然法老关于每一特定阶段持续时间长短的预言可能是不准确的，但这一经济周期的概念却反映了资本主义现实中的重要一面。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世界经济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始终伴随着间歇性的经济急剧衰退。工业经济的发展，持续的经济繁荣不时被经济周期、长期波动、剧烈震动以及破产倒闭所打断。

当然，丰年与荒年始终是紧密相连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变化。在经济繁荣时期，新行业出现，人口流动，价值和前途变幻莫测。与此同时，伴随着野心和希望、可能出现的冲突点以及分歧的领域，政策上的分裂线会逐渐展开。因此，繁荣时期会面临其自身所产生的新社会组织方式、新价值观及日益增长的野心的挑战。而且它们所导致的问题可能又会在下一次的经济衰退时期出现。

但是，只有在经济危机时期，各个系统才会真正受到压力。在艰难时代，通过仔细审视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发觉它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优势和劣势，使观察者看清楚繁荣时期常常模糊不清的各种关系。而在繁荣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则缓解了人们的竞争和挑战倾向。经济萧条时期是旧关系的破裂和新关系的建立阶段。然后，这些新建立的制度和模式将会延续下去，直到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到来。

历史本身常常会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点，由于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很

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实际发生的只有一件。多年以后,成功的选择将会盖过其他可能性,使事情看起来更加明确。【9】这本书聚焦于经济危机创造的一系列选择点。这些变化瞬间对评价理论争议和分析历史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有两个写作目的。一是对同样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刺激”的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政策进行比较。我选择了五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并对它们在近代以来的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动荡中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政策进行审视和研究。这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19世纪末的长期通货紧缩(deflation)、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泛的经济衰落。这些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做了些什么?它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问题都值得解释和说明。在社会科学中,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说明能够使我们进入一个有关国家结构、社会力量、意识形态、国际竞争、领导能力等之间的各种对立性解释的对抗场景之中。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国家之间以及特定的国家在每一次经济危机时期其社会行为者之间的联盟是如何产生、崩溃及变革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所共有的社会团体如何在国内彼此连接以及围绕着什么样的政策进行组合或对抗等情况来了解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

本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这两个目的之间持续性的张力。第二章陈述了一种政策选项的分类方法和一种政策选择的分类方法。第三章至第五章把对各种观点的解释、说明与不同的历史轨迹连接起来。第三章则以这样一种方式尽力探究各种主张,即将所研究案例中的明显特征推广至其他案例的方式。第一章对所有的观点进行了简约概述,而第六章则分析了全书讨论的结果。

读者对各种材料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有些读者在阅读有关分析路径和知识上的理论评论之前喜欢通过案例来收集发现作者的观点。而另一些读者则喜欢在阅读案例之前研究塑造这些案例的概念。这两

种模式都有它们的优点,而且都可以用于本书。那些喜欢前一种方法的人可以颠倒阅读的顺序,先阅读第二部分的第三章至第五章,然后返回来阅读描述理论视点和政策结果的第二章,最后再阅读结论章,即第六章。

我决定集中研究经济困难时代的问题,这可能是受自身经历的影响,特别是受我父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难民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灾祸经历的影响。【10】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在完全不同于我们自身的知性氛围里开始的。1970年,美国面临着越南战争、种族和贫困问题以及美元“悬置”(overhang)*等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激发了我进行拷问和研究的愿望。由于非常渴望在比较的背景下来了解美国所陷入的困境,一群具有天赋的学者聚集在哈佛大学合开了一门“美国政治发展”的课程。我提议讲授关键的1896年美国选举及其跨国比较,这部分的讲授涉及对美国关税的政治经济争论以及在欧洲所发生的类似争论。之后,在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篇名为《国际贸易,国内联盟与自由》(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的论文。

当我还在继续从事其他问题的研究时,我仍保持着对经济危机应对政策的比较研究的兴趣。我想弄清楚那些围绕着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逐渐成形的社会联盟在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大萧条冲击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当我在那些年继续收集资料 and 阅读时,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越南战争作为政治军事问题的重要性日益退减而经济问题却日益严重。事实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每天从报纸上所阅读到的大量内容与较早时期的事件产生了共鸣,使我难以抑制自己继续从事比较研究的欲望。

这些使我萌发了一个相当宏大的计划,即对在三次世界经济危机

* 即美元存储的过剩部分。——译者注

中的五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我受到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作品的鼓舞,他的著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考 and 学识。我追随摩尔的研究方法,探求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应。摩尔仔细研究了农业的商业化过程。在他的同事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影响下,我认真分析了国际竞争对现代经济的不同“分支”(branches)或“部门”(sectors)所产生的影响。

我对那些在知性方面和个人方面鼓励我实施这一计划的人深表谢意,尽管这个计划在规模和分析上都是困难重重的。詹姆斯·克斯(James Kurth)给了我特别的帮助,他劝说我把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写成一篇关于19世纪关税的文章,这篇文章进而成为本书的一部分;马丁·谢弗特(Martin Shefter)在发展自己的美国及比较兴趣时总是非常愿意与我交流不同的观点;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是一个富有思想和敢于批评的读者,他是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丛书的编辑;斯蒂芬·卡拉斯奈(Stephen Krasner)也常常鼓励我,无论我们在具体研究中有什么不同。巴林顿·摩尔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给我提供了一种最好的支持,【11】即在知性上激励和督促我,激发我的创造力,鼓励我多写作,以及推动我把对他们的观点的挑战与追求自己兴趣的自由结合起来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用提名表示感谢以上这些个人的方式使我面临着冒犯那些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巨大帮助的人的风险。这些人是很多的,无论是鼓励、批评,或者阅读,他们的支持和帮助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阅读了我手稿的大部分内容,他们是苏冉纳·贝格(Suzanne Berger)、彼得·考威(Peter Cowhey)、布卢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汤姆·斐古森(Tom Ferguson)、彼得·霍尔(Peter Hall)、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密尔斯·卡勒(Miles Kahler)、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戴维·拉丁(David Laitin)、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米切尔·门德尔鲍姆

(Michael Mandelbaum)、维克多·比尔兹·戴兹(Victor Perez-Diaz)、哈维尔·雷斯科夫(Harvey Rishikof)、辛迪·塔罗(Sidney Tarrow)以及约翰·兹斯曼(John Zysman)等。这些年来以下诸位阅读了我手稿的一部分并给予了非常有益的评论,他们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尼尔·贝克(Neal Beck)、戴维·布罗姆(Devid Bloom)、斯蒂芬·伯恩斯坦(Stephen Bornstein)、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艾伦·科密索(Allen Comisso)、米切尔·多勒(Michael Doyl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帕垂斯·黑格纳特(Patrice Higonnet)、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彼得·朗(Peter Lange)、安德烈·马科维茨(Andrew Markovits)、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摩里·诺兰(Molly Nolan)、约瑟夫·奈尔(Joseph Nye)、乔治·罗斯(George Ross)、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詹尼斯·斯坦恩(Janice Stein)、米切尔·斯坦恩(Michael Stein)、斯塔·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各位同仁。

有几个组织机构给予我的研究以非常有价值的支持。国家人文科学奖助会研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fellowship)帮助我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研究问题,而且使我能够设计出本书比较研究的基本轮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 fellowship)为我一气呵成地写作此书提供了时间,而且基金会的詹姆斯·克斯还就本书的20世纪30年代案例的早期草稿组织了一些研讨会,这些对我都是极大的支持。雷尔曼协会(Lehrman Institute fellowship)组织了一次相当有价值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对本书许多章节的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我发现这些研讨会会激励我进一步改写本书的观点和结构极有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

米切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感谢他在那些会议中的极富智慧的主持,感谢他的评论,同时也要感谢所有的与会者。

我对最近许多事件的认识有着不同的资料来源,这还得感谢其他的一些人。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资助了一个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工会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项目。在这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与乔治·罗斯、彼得·朗、安德鲁·马丁、安德烈·马科维茨、斯蒂芬·伯恩斯坦、毛瑞诺·梵尼塞利(Maurizio Vannicelli)、切瑞斯·阿伦(Chris Allen)一起工作。我们的会议安排、研究领域、会议纪要等都是合作研究项目取得出色成就的良好范例,这对我的帮助是相当大的。这不仅对我和斯蒂芬·伯恩斯坦合写的英国的案例大有帮助,而且使我能够更加广泛地思考当前的形势和理论问题。【12】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由阿伦·乌温(Allen & Unwin)出版社出版的《工会、变革和危机:1945—1980 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战略及其政治经济分析》(Unions, Change and Crisis: French and Italian Union Strateg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1945—1980)》和《工会和经济危机:英国、西德和瑞典》(Unions and Economic Crisis: Britain, West Germany and Sweden)两本书。

另一个合作的成果对我写作法国案例大有帮助。我在为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一次会议组织一批论文的过程中,与斯蒂芬·科恩一起为巴特沃斯(Butterworths)出版社把这些论文编辑成书,即《处于世界经济困境中的法国》(France in the Troubled World Economy)。

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不仅为我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而且还提供了知性和心理上的支持;阿比·科林斯(Abby Collins)、贵多·古德曼(Guido Goldman)、里奥尼·戈顿(Leonie Gordon)以及斯坦利·霍夫曼等是这一巨大支持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另外的支持来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术研究委员会,来源于此校所提供的学术休假,另外的支持还来源于麦

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就我的一部分观点进行讨论的各种讲座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它们是:瑞典朗德大学(Lund)、乌孜大学(Umeå)、斯多科霍姆大学(Stockholm)和阿普萨拉大学(Uppsala)、马得瑞德大学(Madrid)的研讨会;巴黎的社会学研究协会(the Groupe de Sociologie Organisations),其中玛莎·祖贝(Martha Zuber)、皮埃尔·戈雷闵(Pierre Gremion)、凯瑟琳·戈雷闵(Catherine Gremion)以及安尼科·皮切诺(Annique Percheron)等给予了特别的帮助;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洛杉矶和汕塔科如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mpuses a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Santa Cruz)的许多团体都给予了很多关照。

关键性的人力支持来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的职员,特别是李·德威(Lee Dewey)、贝特斯·佛特(Betsy Faught)、朱迪·黎曼(Judy Lyman)、贝特斯·奥登(Betsy Ogden)和莫尼卡·帕斯卡亚(Monica Paskvan);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职员,特别是阿比·科林斯;斯托克汉姆的福布莱特办公室(the Fulbright Offices in Stockholm);哈佛大学、麦吉尔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图书馆。

在编辑方面的帮助来源于各位编辑和《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的评论者们。《国际组织》期刊第32期(1978年秋季)将本书第四章一部分早期的观点作为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即《颠倒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跨学科的历史》(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期刊也发表了第二章的一些早期观点的内容。康乃尔大学出版社的瓦特·利普科特(Walter Lippincott)和罗吉·哈顿(Roger Haydon)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家庭也是一个人工作的一部分,我的家庭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极大的鼓励。我的妻子丽莎·赫希曼(Lisa Hirschman)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知性营养,而且花费了晚上和周末的大量额外时间来帮助我。【13】我的孩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尼古拉斯(Nicholas),虽然由于太小还不能阅读这本书,但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快乐,这本书占用了许多我与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的母亲赛尔娅·古勒维奇(Sylvia Gourevitch),对我的手稿提供了思想上和实际上的帮助。非常遗憾的是,我的父亲亚历山大·古勒维奇(Alexander Gourevitch)还没能读上这本书时就去世了,我写这本书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了解和认识决定我父母生活的各种力量因素。我妻子的祖父尼古拉·查普洛(Nicholas Chapro)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推动着这本书的进展,也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我要对以上所有这些人表示真诚的感谢。文中的谬误由本人负责,优点当归属于大家。【14】

彼得·古勒维奇

于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 California)

中文版前言*

三十年前,当有关这本书的想法和研究正在进行时,全球化还只是一个极少使用的术语。现在,它已变得很平凡,且有争议。但无论它意味着什么,那时的中国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今天(2009年)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包含中国在内。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占其 GDP 的 40%,进口为 GDP 的 32%。作为多种产品的进口国,中国已然成为许多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澳大利亚、东南亚到巴西、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 FDI)平均占到 GDP 的 4%,为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① 但是在近些年,由于巨额的国内储蓄,中国也出口大量的资本,多于 FDI 流入的两倍,补充着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中国 and 世界经济相互影响:中国通过出口提高了生活水准,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它的文化、认同和政治结构。通过进口,中国激励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而通过出口,它又影响到那些国家的工作机会和投资。

当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思考本书时,所有这些对于中国都是无法预言的。那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封闭。它的经济运行并不是依据市场的原则。极少有外国投资,出口量很小,旅行也不方便。

* 感谢 Celia Falicov、Barry Naughton 和 Mike Tierney 对早期的初稿提出的意见。

① Barry Naughton,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 378, 404。基于中国官方资料的最近版本。

中国试图将自己与世界经济隔绝,并将其他国家带向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

如果我将中国涵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经济中,那么它就是一种国家计划的经济,像苏联那样。如果我今天才开始写这本书,那么中国将成为“混合”经济模式的一个案例,虽然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而不同于本书的其他案例。混合经济模式是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广泛介入经济,且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私营部门。大部分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上去都是这样的国家,因为它们对主要的行业和公司实行广泛的国有化。正如格申克龙所观察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俄国形成的市场经济带有积极的国家介入。德国也同样如此,尽管它比俄国拥有一个更强大的私营部门。这些都是考伯特主义(Colbertism)的表现形式。借用来自 17 世纪法国的案例,考伯特主义是对国家引导的市场增长(state led market growth)的标准说法。在当代,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体现,为其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做出了榜样,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NICs)。现在,中国正在形成这种模式的一个版本,增长结果蔚为壮观。

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却又能如此成功,使得现在的中国引人注目。正因如此,中国的例子引发了许多困惑,特别是对于一些在西方学者中十分有影响力的理念,即:活跃的国家预示着掠夺行为,这将使投资者缺乏安全感,从而阻碍到经济增长。我将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讨论这一观点,但在此之前,我将解释本书的形成情况、为何中国不包含在内以及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我将会探究哪些主题。

在三十年前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没有将中国涵括在案例中,是由于它尚未融入国际市场经济,还由于它的政治制度。那时,我关注民主或政党政治是如何应对国际经济的压力。我了解国家是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因而,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我而言似乎有极大的缺陷,因为在那时它们被截然分隔成两种不同的学术领域。专门研究某一国家的专家钻研国内因素:他们考虑制度、文化、政党、领导

人是如何与生产结果相互作用的。但他们极少考虑国际因素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的。

反之,国际关系的研究忽视了国内的变量。它将国家当成单一整体,追求单一的地缘政治视角的“国家利益”。国家被视为有关安全因素最大化的效用函数,而安全问题则来源于外部环境。这些外部压力越强大,就越不存在国内的差异以及有关国家利益是什么、如何取得国家利益的争议。通常,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都是非历史性的,关注当前的事件,而忽视发展的模式以及现在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在写作本书时,我试图通过探寻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来打破这样一些屏障。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引起了各个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应,它们纷纷表达着各自的不满。

我的兴趣是因我的家族历史而形成的。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来自沙皇俄国的南部地区,现在已成为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罗马尼亚。我母方的曾祖父是来自靠近齐森诺(Chisenau)(达克齐尼夫(Kichinev))的小镇的一个粮食商人,后来迁到敖德萨(Odessa),那里是我母亲的出生地。他出口粮食,如同布宜诺斯艾利斯、芝加哥和温尼伯湖的粮食商人所做的那样。全球运输将各个市场连接起来,因此这些城市腹地的粮食价格造成了世界价格的下跌。这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竞争力,迫使他们从乡村流向工业化的城市(如同现在的中国)或移民(如同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许多中国人那样)。农业价格的崩溃强化了德国的军国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因此反过来促成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内战引发了饥荒,我的曾祖父就死于敖德萨的饥荒中。

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者。他们都属于俄国孟什维克翼的社会民主党(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人。我父方的祖父(来自耶卡塔诺斯雷夫(Yekatarinoslav,即现在的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后来死于清洗运动。我母方的祖母于1923年来到柏林(带着我母亲和舅舅)并开始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German Social Democrats, SPD)活跃于工会政治。我父亲于

1931年得到许可离开苏联,并在柏林加入了被放逐的孟什维克党员团体。1928—1929年间,世界进入急剧的经济衰退,以1929年10月著名的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崩盘为象征。失业人数快速上升,达到德国人口的25%(在美国也同样如此)。当时相对来说还不那么重要的纳粹党在每次选举中都获得了支持,在1932年的德国国会选举投票中支持率达到了37%,这绝不是大多数——我们不能说希特勒是被大众选举上台的。但它使得纳粹党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几次建造保守联盟的努力失败之后,这个议会中的最大党有了足够的能力让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为总理。这使纳粹及其部分盟友全面地控制了德国。

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我的家庭于1933年从柏林逃往巴黎(我的父母于1938年在巴黎结婚)。他们的政治信仰,而非犹太血统,为他们敲响了危险的警钟。当纳粹分子在1940年入侵法国时,我的父母在美国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逃向美国。许多亲戚并不如此幸运,都被纳粹杀害了。我的哥哥和我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纽约。

这样的家族陈述说明了国际力量对国家和个体生命形成的影响力。过去150年所发生的大事件及其进程——19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依赖,俄国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的接管,法国的失败,德国和日本战争机器的失败,战后西欧的复兴,民主的传播——只能通过研究国际和国内政治的互动、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连接、军事主义和经济制度的连接,以及那些支持和平且有助于宪政民主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条件,才能被理解。

我对国际和国内互动关系的观点形成于一篇短文,即《颠倒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①(1978),它是最经常引用的文章。国内政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但实际上国内政治自身是

①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Autumn 1978): pp. 881—911).

受世界条件影响的。短文《国际贸易、国内联盟和自由》(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①厘清了 19 世纪晚期的这些关系,学界对这篇文章的肯定鼓舞了我将分析延展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后的时期,因此写了这本《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比较资本主义”(comparative capitalism)的主题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国家所面临的选择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模式之间,而且是在民主政治下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这些选择包括:需求刺激(demand stimulus)有多大,通货膨胀(inflation)与低失业率之间的消长关系如何,在医疗、退休方面有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水平,何种教育以及对谁的教育,对具体的行业采取何种类型的支持,在能源、环境、安全方面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公共服务、创新和变革等方面的差异十分显著。例如,艾斯平—安德森^②(Esping-Anderson)、艾弗森(Iversen)和雷恩^③(Wren)分析过有关价格稳定、增长和平等三者取舍问题的三种市场经济模式,以此来阐释国家选择何种类型的取舍需要进行政治运作,并阐释一个或另一些联盟(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或新自由主义)是怎样获得胜利的。

这些利益联盟源于本书所研究的那些危机以及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政治创新和改革的动力。危机为不幸的个体和利益集团创造了对危机作出回应的需求,他们被下降的价格、失业或进口所扰乱。剧烈的危机公然打破了既存的各种联盟,为政治操作者(political entrepreneur)

①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1977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81-313, vol. 8.

② Gosta Esping-Anderson,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the Polity Press.

③ Iversen, Torben and Anne Wren, 1998.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50, pp. 507—546.